

湖南文史

4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1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1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高原 朴永子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6 字数183,000 印数11,500

版次/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CN43—1175

定价/2.50元

· 地下斗争风云 ·

星沙风雨四年间…………… 傅白芦 (1)

——解放战争期间新闻界斗争漫笔

并非“前言”

第一个十四个月(1945年10月末至1946年底):

艰难的起步,东打一枪,西开一炮,为布不成战线而苦恼

第二个十四个月(1947年至1948年2月):

进步力量增长,认识在提高,作风有改进,正气上升了

第三个十四个月(1948年3月至1949年4月):

多个渠道、多个方向获得重大发展的年月

也不是“结语”

忆中共湖南省工委派我送刘正等去湘中一支队

…………… 汤健民 (54)

· 烽火忆往 ·

中国远征军为重开国际通路对滇缅日军八大军事

据点的攻略…………… 陶 铸 (58)

驰援滇缅战场

重建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渡怒江全线出击

攻略日军八大军事据点

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芒友

2438 65

国民党新二十师在新田抗击日军前后…………… 李以匡 (93)

· 湘籍国民党将领 ·

刘廉一和六十七军在国共战争中…………… 毛德传 (97)

唐星事略…………… 苏缙如 (103)

唐星的主要经历

唐星的为人处事

· 军 事 史 料 ·

考入黄埔六期的回忆…………… 李定陆 (112)

六十三师追击红军长征回忆…………… 胡啸华 (118)

攻占莲花与包围苏区

红军突围北上 先遣部队西进

追击红军 主力入黔

调回湘西 再次入黔

记蒋介石国府警卫师(军)从成立到改编后

两次被歼经过…………… 应起鹤 (126)

瞿伯阶瞿波平为匪起家与被剿灭始末…………… 陈嘉章 (136)

一、湘西土匪内幕

二、瞿伯阶与瞿波平

三、湘西土匪实力及活动范围

四、起家过程

五、玩弄缓兵计

- 六、傅仲芳进剿湘西土匪
- 七、抗拒围剿阶段
- 八、瞿伯阶对付国民党军的经验
- 九、土匪抢劫辰溪国民党军械仓库
- 十、国民党八十六军进剿湘西土匪
- 十一、潘文华进剿湘西土匪
- 十二、接受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收编
- 十三、瞿伯阶任命侯振汉为少将参谋长
- 十四、瞿伯阶病危气死后瞿波平继任师长
- 十五、瞿伯阶带兵手腕
- 十六、瞿波平投诚经过

· 湘 籍 文 化 名 人 ·

谢厚藩自述…………… 刘 欣 标校(187)

湖南第一个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老报人李君尧… 刘乐扬(192)

- (一) 概括一生 为而不有
- (二) 从“五四”运动到红军攻入长沙
- (三) 伸张正义 甘做穷报人
- (四) 第一个和共产党合作的湖南报人
- (五) 联桂反蒋 通蒋抗日
- (六) “文救”·桂系·现代剧社
- (七) 《和平、奋斗、救中国》
- (八) 从《全民日报》到耀祥书院

· 文 坛 旧 事 ·

忆三十年代前期的长沙文艺界…………… 傅举晋(210)

· 建 国 后 史 料 ·

建国初期湖南知识青年赴新疆记事…………… 马志正(215)

沅陵外侨登记的前前后后…………… 刘果毅(229)

星 沙 风 雨 四 年 间

——解放战争期间新闻界斗争漫笔

傅 白 芦 •

并 非 “前 言”

李一氓集宋人词成一对联赠夏衍，其下联云：“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夏公非常喜欢。后辈中平庸愚钝如我，对此也十分欣赏。岂敢附庸风雅，不过是心际之间有些相通之处罢了。

因为，近几年来，催写回忆录者甚多，有的来自原来工作过的报社，有的来自故乡。我厮守长沙的时间最长，度过四十寒暑，且又同居一城，找我的同志就更多一些。但每每为我所婉谢。这倒不是谦虚，而是由于惭愧，也由于不想再寻旧梦。可是，有些老朋友渐渐有了责难之意。有的还说，解放战争时期长沙进步新闻界中，自始至终亲历了风风雨雨的，只你一人，你怎么如此顽固！尽管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比如，1949年4月中旬到8月长沙解放这三个月里，我就已经撤离了；至今健在的也许不只是我一个。但责难者大义凛然，倘再不报

• 傅白芦 当时在长沙新闻界从事地下斗争，建国后曾任《湖南日报》总编辑、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命，恐怕只能以词穷理屈而获罪终身了。为求免罪计，是应该写一点的。

然而，写回忆往事一类的文字，本是世间一大难事。第一是难得真实。虽然事多亲历，但当年时断时续写的一些日记俱已丢失，仅凭记忆则难于完全准确；而且发生的事情是那么多，不可能一一知道；有的事因参加者所见不尽相同，很可能有不同的记忆；有的人又或已远离长沙或已在十年浩劫中离开了人世，不可能齐集一起相互核实；至于挂一漏万，自是更所难免。如果自己史德不修，甚至连人与事的姓名、职业、关系都搞不清楚，还总想在脸上贴金，那就更会使历史无法成为信史。第二是难于搜集资料。党领导的新闻界的斗争，总是要在新闻纸上反映出来，而且总是以其自己的特有形式反映出来，比如，一则中央社的电讯可以做这样或那样的标题，一个版面可以作这样或那样的编排，一篇言论可以正面文章反面做也可以反面文章正面做，一条新闻可以这样采写也可以那样采写……不管是它的幼稚还是它的成熟。如果不能从新闻纸上得到反映，就难以说明党是如何通过报纸去发挥它的领导作用的。但是，现在要找到某家一套完整的报纸，已经不是容易的事；要找齐解放战争时期长沙出版的各种各色的报纸，更是难上加难。资料找不到，何来准确的回忆和切实的研究？第三是难于恰如其份地叙述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党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是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来实现的。可以通过各种党的组织和各种进步组织，也可以通过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的各种报刊。党对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的领导作用，同样是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来实现和发挥的，不可能由某一个党的组织用一条单一的线就把错综复杂的斗争串连成绚丽多姿的画卷。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即使当年是亲历其事的担任了负责工作的地下党员，恐怕也难

以叙述出它的全貌……正是上述种种难处，要写出一些像样的回忆文字，真如《全汉文》中东方朔笔下的非有先生所云：

“可乎哉！可乎哉！谈何容易？”

然而，老朋友们还是要我写。那就提供一点只具原始形态的材料，供治史的同志参考吧，写了出来，也便于同志们纠讹匡误，随手写来，故曰：“漫笔”，盖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但愿在相濡以沫的时代早已逝去后，让这类“漫笔”能相忘于盛世的江湖之中。如此而已！

第一个十四个月（1945年10月末至1946年底）：艰难的起步，东打一枪，西开一炮，为布不成战线而苦恼

1945年8月，贵阳力报以“东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为特号字标题，与重庆的新华日报的标题不谋而合地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此前后，总编辑李幻如应湖南中央日报之邀去了安江；副总编辑吴启彦因同族长辈吴奇伟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之便而到湖南国民日报任副社长。力报老板雷锡龄要把报纸的招牌卖给贵州的地方势力。编辑部只留下编辑主任傅白芦同其他一些朋友苦撑残局，不能不纷纷思去。9月末10月初，蒋介石策动搬倒龙云政变成功，作为大后方民主运动堡垒的昆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萨空了、杨人鸿被捕，高天出走，黄明夫妇撤到贵阳。老友重逢，共商此后去向。听说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已进入湖南，因而参加新解放区的建设，成了大家最好的选择，于是决定返回在抗日战争时度过艰难日子的衡阳，以便在湖南就近寻找南下支队。此时，雷锡龄的买卖已经成交，有了钱可发给复员费。10月25日，一辆带蓬货车把大家驶离贵阳。同车的是黄明、傅白芦和蒋壘三对夫妇以及朱宗、蔡克诚、李峰、庄云光等。车到衡阳，一派断壁颓垣，力报的复刊毫无着落。而打听所得，南下支队也早已北

返。蒋璠夫妇是衡阳人，算是归家了；其他诸位茫茫然不知何往。黄明和傅商定，到长沙去找吴启彦。

吴启彦，四十年代初曾在桂林国际新闻社工作，他和黄明早就熟识。在贵阳力报又与傅、朱、蔡、李共事，相处尚好。他到国民日报虽是副社长，但却掌握实权。社长郑某只是个挂名的官僚。启彦甚为大度，慷慨地接纳了这七、八个人，使大家在极度困难中有了个立足安身之地。

国民日报是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的机关报。总编辑是留任的容朝汉，也是广东人。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新来的同事们不事排挤，也不亲近；对编辑工作只要不太出格，一般也不加干预，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启彦关注的是地方新闻，此类稿件非经他审阅签字不得发排。这是吴奇伟之命根所系，是能够理解的。言论必随当局的意旨而俯仰，雍容华丽，系湖南老报人刘虚等所主持。黄明被聘为编辑主任，傅为要闻编辑，朱为国际新闻编辑，蔡为助理编辑。这样的安排，在当时已经十分令人满意，虽然工作只能局限于对中央社新闻稿作标题处理和版面编排的一隅之地。不久，张兆汉来任经理，刘国安来做外勤记者，李峰也来编辑部工作。在那个时候，先先后后进了这么多的人，启彦有如此胆识和气度，是应该受到人民的感激的。然而，在这个报纸中，我们能做些什么？

其时也，蒋介石已经违背《双十协定》，继续派遣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疾进，挑动内战。人民则在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国统区的重庆、昆明等地，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勃然兴起。12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作出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1946年1月，停战协定正式达成，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时机。

黄明（现在是中共福建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是三十年代初入党的共产党员，较长时期从事文化、新闻方面的工作，那时，他的组织关系不在湖南，张兆汉也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较长时期在闽台同胞中做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刘国安当时是中共长沙新闻支部书记，现在是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他们之间似乎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在工作上却是配合默契的。傅白芦在1945年末，由在上海的孟秋江吸收为国际新闻社社员，国新社是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新闻机构，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在上海抢先占领文化阵地的指示精神，迅速恢复组织活动，当时处于秘密工作状态。有三位老大哥牵头，不足二十二岁的傅和其他一些小老弟与之配合，工作就协调起来。为何用“协调”一词？那时候，彼此的身份并不像此时所见的这般等级森严，大家都是朋友，相互亲近。有的可谓畏友或诤友，一方尊而敬之，另一方只是以其道德文章产生无形的影响而具有吸引力。有的虽是朋友，在工作上可以合作，但某一方以自己的种种作为而令人敬而远之，志同而道不合，难以具有吸引力。志同而又道合，始称“协调”。这个时候，大家是协调的。经过商量，认为可以做一些事情了。做什么？当时还没有“红头文件”，没有层层传达贯彻，也没有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当然也不可能送交某一位领导审阅稿件，靠的是各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阅读和领悟，靠的是各人对当时可能读到的党的报刊上传播的文字的理解，实际上亦即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至工作方法的理解，靠的是朋友之间的推心置腹般的交谈和通讯。于是根据自己的领悟和理解进行宣传和其他工作；于是，大家想到一块来了，此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优良的传统和工作方式，在国统区的进步新闻界，是屡见不鲜的，大概可以称之为党发挥对国统

区报刊的领导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吧。所以，这个时期的国民日报的标题和编排，在一些敏感的读者看来，是饶有兴味的。然而，如前所述，国民日报本身具有局限性，要维持这样一个阵地已非易事，当然更不能使启彦过于为难，而大家又兴致正浓，因此有了创办《人民世纪》周报的设想。此时，国新社老社员杨人鸿在昆明脱险至重庆，并和曾参加国新社工作的李瑞章，经由黎澍介绍，都来到国民日报，分任行政、记者工作。

《人民世纪》，由黄明化名袁度担任社长，请肖敏颂出任总编辑，傅白芦做些具体的编辑工作。出版的许可证，是李瑞章及其夫人肖柏利用社会关系（肖柏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的远房侄女，中央通讯社长沙分社主任肖宏宇又是肖同兹的堂弟）弄到手的。印刷纸张因为有张兆汉当经理而在国民日报内部解决。国安内外操持，十分辛勤，他和其他一些朋友什么事都干，包括校对和发行在内。发行工作也是“无孔不入”，别的渠道且不说，每期还寄几十份到江西萍乡，要傅白芦作小商的父亲代为推销哩。后来知道，办这件事情，国安是请示了唐先生（周礼）的。肖敏颂能够出担重任，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又是民主同盟中的骨干，且为湖南知名的知识界人士，大家一见如故，谈话投机，不必拐弯抹角就很好地合作起来，并且还打算就此开展民主同盟的工作。记得在商量创办《人民世纪》事情的某一天，肖敏颂、黄明、刘国安、杨人鸿、李瑞章、傅白芦等同在瑞章的住处，敏颂提出，此刊最好以接近民盟的面貌出现，以免国民党怀疑是共产党办的，于是大家签名加入民盟。之后，肖将名单投入火炉中烧掉，说：“大家都是盟员了。”这在当时的进步文化界，是一点不稀奇的。又由于刘国安的活动并不只是在报社等等原因，湖南大学学生运动中的中坚汪澍白，通过南方局青委的关系在湖大创建了其中有易鼎铭（即杨翊，系易礼

容的公子)等组成的世纪社,此时也在岳麓山下办起来了《天下文萃》杂志,一报一刊的人员由此结识,形同姐妹报刊,互成犄角之势。这两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入湘江,虽然不可能掀起洪波,当然也不只是泛起一圈圈的涟漪。这一报一刊,大概可以看作是解放战争时期长沙最早出现的在湖南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非机关的报刊吧。

可惜,现在无法找到一张《人民世纪》报、一份《天下文萃》了。记得《人民世纪》的大体内容是:通过发表时评、政论、通讯、读者投书、杂文等等形式,揭露美蒋勾结挑起内战的阴谋,抨击蒋介石政权残民以逞的暴政,报道各地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活动,传递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据瑞章回忆,第一期上刊有他和肖柏合写的长沙地方法院看守所的访问记,署名为李群,揭露国民党政权是如何优待汉奸和如何虐待新四军战士的。《新华日报》收到这一报道,立即予以转载。《天下文萃》的内容大致相同,不过侧重于转载国内外进步报刊的文章。此二者之中虽有曲笔,自然还是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当局。都没有出满十期,就被他们扼杀在摇篮里。至今还记得清楚的是,最后一期是两家联合出版的。于是,黄明出走武汉,国安转到唐耀章办的大晚报工作了短短时间即南去广州后转衡阳,傅则回到因抗战离乱而阔别多年的萍乡老家小住。在《人民世纪》势将被迫停刊之际,在周礼领导下的邓钧洪和他以及刘东安、安国在桂林开书店时认识的官健平也进到国民日报,开始新闻工作的生涯。其后不久,邓受命介绍官入党。

这时的长沙新闻界,实际上已开始热闹起来。新潮日报从常德迁来长沙,于1946年元旦出刊,编辑部是由从昆明来的董祚楷、李龙牧、段镇坤、于干等负责,作为民间报纸,办得颇有新意,引人注目,后来,刘东安也曾去那里工作。中央日报在此前已自安江搬回长沙,李幻如仍任总编辑,邀来华嘉主编副

刊，发表了不少好文章。长沙报界的老报人康德、陈楚等也回到了长沙。其中，有的原是抗战熟识的老友，有的是彼此知名相见恨晚的新朋。自然有了能够互通声气，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机会。可是，《人民世纪》等的被迫停刊，表明国民党当局在重庆较场口破坏庆祝政协成立大会的肃杀之气已刮到长沙，原先期望在此间形成新闻界的活跃局面难以实现。董、李、段、于等离开了新潮日报，北去武汉转往其他适合立足的地方；中央日报社长段梦晖虽然开明而有胆识，但也抵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华嘉只好南去广州，李幻如终于被挤了出来，到邵阳去办也是由段任社长的昭报。

昭报创刊于1946年的暮春时节。它是段梦晖和邵阳地区出生的军方和地方的头面人物集资筹办，是“为桑梓服务”的民营报纸，由段兼社长意在可以由他和当地上层周旋，由李任总编辑是要把报纸办得有自己的特色。幻如于是找来蒋牧良为副刊主编，汪敏慧为评论部主任，孟树德为采访部主任，傅白芦为编辑部主任，张翹翔为编辑，孟柯是资料员，康骥是校对。傅在衡阳大刚报做资料室主任时与衡阳力报的李、汪结识，后来又在贵阳力报共事；李与孟树德曾在衡阳力报一起工作过；孟曾向《人民世纪》投稿，给傅留有较深印象；蒋牧良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当时其党的关系似不在湖南。老友新朋，相互尊重，大家合作得很好。这张报纸以“服务农村、启迪农民、发展农民”为宗旨，号称全国唯一的农民报纸，要作农民喉舌，要反映农民疾苦，要建设新的农村云云。这些编辑记者堪称天真得可爱，果然按此办事，虽然力求不露锋芒，但出版不到百天，即被邵阳地方势力视为眼中钉，报经国民党南京当局电令查封。其时，蒋介石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已经发动，区区昭报自是“在劫难逃”了。亏得段梦晖自己跑到邵阳来料理后事，将这些工作人员接回长沙并且作了较为妥善的安置。幻如不便

再回中央日报，因而去了湖南日报；中央日报请蒋牧良去主编副刊《平明》，请孟树德去做农村特派记者，后提升为采访部主任；请张翊翔去做编辑。傅白芦婉谢了段梦晖的多次邀请，去新潮日报任主笔。

傅到新潮日报，大概是1946年的6月中旬。给他留下这个记忆，是因为不久，长沙人力车工人反对开明汽车公司增辟行车路线而大举罢工，并砸烂汽车的事件发生；又不久，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接连暗杀了民主战士李公朴和闻一多。此前，长沙力报因编辑周燕奴（汉平）在一条中央社发的电讯稿上做了个“国防部新闻局加强内战宣传”的标题，而被罚停刊三天。全国和长沙的政治气候，较之刚离开的邵阳，尤为恶劣。这个时候的新潮日报正处于穷愁潦倒的境地，每日印刷不足千份，只供应饿不死人的饭菜，工资常常不能按时按数发给（有朋友嘲笑傅白芦，待遇优厚的中央日报不去，真是活该倒霉）。国民党高级将领霍揆彰虽是这家报纸的创办人和董事长，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对它的困难只是听之任之。社长黄定戎自兼总编辑，晚班编辑工作主要依仗其外甥曾楚樵料理。曾是民国大学的学生，为人诚笃，在学校受过进步教授的影响。黄已请肖敏颂为兼任主笔，每周写社论两篇，常有精彩文章，现在有了一个专任主笔，两人原是老朋友，此番再度合作，当然十分可喜。黄定戎要傅每周写三篇社论，以为还有余力可贾，又要他兼管晚班编辑工作，再编副刊《新潮流》。不久，杨人鸿在国民日报也站不住脚了，感谢黄的大度，接纳为国际新闻编辑。人鸿曾为金仲华等国际问题专家的论文配绘地图，颇获好评，此时来和大家共尝艰苦（后来，段梦晖请他去中央日报专职绘制地图，却为内中的右翼人物所排斥，乃与蒋牧良先后离开长沙，蒋去上海，他在傅白芦转致高天来信后应嘱去国新社香港分社工作）。从延安辗转来湘的周沙尘，在这里做外勤记

者，还办了个刊物名叫《活路》，为时较为短暂，就东去上海了。这样，傅、杨和勤勤恳恳做校对工作、更渴望阅读进步书刊的罗厚仁、唐厚章等四人，每晚从小吴门外的校场坪步行到北区的赐闲湖的工厂上班，逐渐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快活的小集体。这在中央日报是不可能有的。新潮日报的经济状况实在是太困难了，铅字磨损得模糊不清，想另铸新字也无法可想，要革新版面自是越发艰难。只能维持残局，在标题上做点小文章，偶而发表几篇尚可一读的社论，或在副刊上的短短杂文中透出丝丝新鲜空气，谈不上有大的起色。

写到这里，似有必要略述一下国际新闻社孟秋江对傅白芦的培养和领导。傅对秋江仰慕已久，但缘慳一面，没有得到亲聆教益的机会。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原先已进入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秋江，立即受命恢复1941年被国民党封闭的国新社的秘密活动，并为创办《周刊》、《文萃》，支持《联合晚报》问世等开辟新阵地的工作而日夜奔忙。在此时际，他大概听朋友们介绍了傅在衡阳、柳州、贵阳等地工作的一些情况，就用孟可权的原名给傅写信，吸收他参加国新社。时过四十年，有些信的主要意思还深深留在傅的记忆中。当时，时局扑朔迷离，令人心急如焚。秋江的信，对形势的精辟分析，使人由困惑而豁然开朗；亲切的嘱咐，真挚的感情，使人深感信任的温暖；交办的事情简明扼要，说了不用真名实姓撰写通讯，说了主要是广泛剪集长沙的报刊资料邮投上海某号信箱，使人从中得到举一反三的启示。此后一段时期内，傅白芦除了写通讯、搜集专题资料、剪辑各色报刊发邮之外，他参加编辑的报刊，能够运用多种形式，紧紧扣住——动员人民抛却幻想、揭露美蒋勾结发动内战的罪恶、支持人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这个主题发新闻，做标题，写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秋江信中的指点。《人民世纪》和